广州市试行扩大国营财贸企业自主权

新华社报道,广州市决定从现在起全市所有国营财贸单位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另外把南方大厦百货商店、妇女儿童百货商店、五金交电化工公司、针棉织品批发商店、红书肉菜市场、海珠糕点厂6个单位,作为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

实行企业自主权后,全市财贸企业分别实行3种不同的利润留成办法:一是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分成;二是全额利润留成;三是政策性亏损企业实行减亏分成或定额亏损包干。在工资制度方面,凡是有条件的企业可试行计件工资制。饮食服务行业可试行提成工资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单位可以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和市场的需要,编制本企业的经营计划;有权选择进货地点和选购商品;有权决定经营方式,扩大经营范围和增加服务项目,增设网点;有权支配使用国家拨给的资产和按规定提留的各项资金;有权根据国家规定的价格管理权限和政策,制定部分三类商品价格,包括浮动价格、议定价格和季节、地区、品质差价,以及对呆滞、残次商品削价等;有权在上级批准的编制订员和劳动计划范围内,确定机构网点设置和人员配备、择优招工、选举干部、奖惩职工等。

《人民日报》发表吴象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并配发编者按

编者按:最近一个时期,在一部分省、市、自治区,在干部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中央已经从政策上作出了规定。

本文针对关于包产到户的一些议论,就包产到户这一形式的由来、利弊、性质、前景等问题,结合实际作了一些阐述和探讨,可供参考。有不同意见,希望展开讨论。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如果明明放着阳关道不走,偏要去走独木桥,那当然很不足取;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说这话的人,倒颇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他不盲目追随别人,敢于从当地实际出发,去闯自己的路。试以此为引子,谈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

一、由来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经济形式。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巩固或者比较巩固,生产条件有了初步的改善。目前,全国灌溉面积有7亿亩,大中型拖拉机60多万台,各种农业机器总动力1.8亿马力,社队公共财产800多亿元,社队企业总产值已占农业总

产值的1/3。总起来看,农业生产有比较大的发展,全国人口增加几近一倍,而人民生活基本稳定,这个成就是不能低估的。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这是一条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集体化即合作化运动,既有成功的经验,又经过几次曲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由于强调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调典型示范的办法,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1955年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农业连年增产。可惜,1955年冬合作化高潮兴起以后步子走得过急,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贪多贪大、强迫命令的错误。1955年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只占4%,到1956年年底已猛增到98.8%,原来计划“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的艰巨任务,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为数甚多的农民,是从互助组甚至单干的情况下“一步登天”直接进入高级社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全面合作化的条件并未成熟,同农民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适应。因此,1957年不少地方出现了“拉牛退社”的风潮。当时没有强调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对合作社进行必要的整顿、巩固,然后再去发展,却强调反右,用所谓“两条道路大辩论”去堵击所谓的单干风。这就孕育了以后更大的错误——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社队规模越变越大,公有化程度越拔越高。直到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才划小核算单位,强调等价交换,明确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1964年“四清”运动中,又把根据八字方针确定的一系列农业政策视为“右倾”和“资本主义复辟”,自上而下地进行批判,造成严重的恶果。

这种离开生产力的状况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错误,在十年动乱时期,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恶性发展为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遭到令人痛心的破坏。据1976年、1977年统计,全国有200来个县生产水平接近解放初期,其中少数还低于解放初期。今年夏季,据全国504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统计(比总数略少),每人平均收入100元以上的不到25%,50元以下的占27.3%,其余50%左右在50元至100元之间。一部分很穷的生产队中最穷的,连温

饱问题也不能解决,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经常过着“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日子。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就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就办不好,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挣扎的农业人口,达到1亿左右。这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左”倾思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劳动管理、生产指挥上的主观主义——干活“大呼隆”、没有自主权,打消耗战、疲劳战,时间长而效率低;二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不一定少得,有的不劳反而多得。这两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在那些长期落后、贫困的社队,显得更为严重。

中国农民深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得到了土地,是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即使在那些长期落后贫困的社队,集体经济已失去吸引力,农民仍然没有表示要背弃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在社会主义许可的范围内,自发地努力寻找摆脱恶性循环的突破口,这就是包产到户的由来。

早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许多省、区都有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安徽曾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过“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尽管此后反复遭到严厉的批判,但是某些地方或明或暗的包产到户从未间断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强调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并肯定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暗地里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公开了,并在贫困落后的地方迅速得到发展。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实质上反映了一部分农民对“左”的政策和路线的反抗。有些同志指责这是“宣传上的片面性”或者“领导提倡”的结果,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当然,不能否认领导是个重要因素,领导支持或者反对,情况可能大不相同。但是,既然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群众性的强烈要求,就不能不从客观的经济条件去分析。包产到户是不是独木桥?能不能走、应不应走这样的独木桥?也就成为不能不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二、利弊

为什么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呢?一句话,它适合那些地区群众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需要。

两年来,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类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对于纠正主观主义和平均主义都有作用,因此都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但是比较起来,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更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而在那些长期落后贫困的社队,包产到户或包产到劳又比包产到组效果更为显著。包产到户或包产到劳的具体做法一般是“三包”、“三统”:包工,包产,包费用。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双方签订合同,超产者奖,欠产者罚。这种办法对改变落后队、贫困队的面貌,具有特别显著的作用。这一点不仅在某些社队,而且在县的范围内得到充分证明。比如,安徽省肥西县,河南省兰考县,山东省东明县,甘肃省陇西县、通渭县、会宁县,由于实行包产到户或其他类似办法,加上得力的增产措施,都结束了长期吃返销粮的历史,面貌开始大变。

今年六七月间,国家农委曾组织有关部门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分组到十几个省进行调查。尽管对包产到户的利弊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长期落后贫困的社队,包产到户经济效果最显著,可以迅速改变面貌,这一点却是公认的。从大量的调查材料看,联系产量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所以更能调动社员积极性,主要由于它有以下几点好处:

(1)能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保证社员的物质利益。不仅包产部分能分到合理的一份,而且超产归己,劳动越多,报酬越高,因此社员愿意把自己潜在的劳动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2)能有效地抵制瞎指挥,真正实现民主办社。过去“大呼隆”干活,干部往往只对国家计划和上级任务负责,管得太宽、太细、太死,压制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现在社员对产品产量承担了经济责任,就有理由抵制瞎指挥,也有权力用最小代价(成本,包括活劳动)取得最大效果,保证增产增收。

(3)能有效地抵制平调和多吃多占。平调和多吃多占,给农民增加了沉重负担,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实行了联产责任制,超产部分无法平调,包产部分社员心里有数,除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和该留给集体者外,再搞平调不容易了。农民劳动不白搭,心情舒畅了。

(4)能有效地促进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过去集体经济浪费多,开支大,成本高,是个普遍现象。现在种田责任明确,农民可以因地制宜,灵活掌握,处处精打细算,力求节约成本。“尖头户站,滑头户看,老实户气得不愿干”的现象没有了,“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的一年到头打疲劳战的现象也没有了。由于工效提高,还可以腾出时间发展家庭副业,增加更多的现金收入。

应当指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只能适应一定的条件,也都有待于完善和提高。包产到户更是如此。落后贫困的社队采取这种责任制,增产效果特别显著,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有的地方把这些矛盾归结为“十大不利”:不利于大型农机具的购置、使用、维修、管理;不利于统一管水,合理用水;不利于保护耕牛;不利于防病灭虫;不利于试验和推广科学种田;不利于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抗灾;不利于统一规划,调配劳力进行农业基本建设;不利于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多种经营;不利于水土保持;不利于照顾四属户、五保户。新的矛盾,有些是由于分散经营造成的,但大部分属于工作上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又往往发生在刚搞包产到户而领导放任自流的地方,通过做好工作,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并非包产到户必然的结果。比如,安徽省六安县许小河公社在搞包产到户时,部分生产队私分储备粮 20 万斤,造成耕牛死亡事故 3 起。公社党委及时作了处理,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情况迅速好转。今年以来,全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新购买耕牛 27 头,拖拉机一台,汽车一部,榨油机一部,大型农具 122 件,全公社计划午季上交积累 4 万元,实际完成 5.29 万元;计划还贷款 1.24 万元,实际完成 2.3 万元。生产队存款 4.3 万元,社员存款 2.3 万元,这是近几年来所没有的。由于生产发展,生产队公益金增加,对四属户、困难户的照顾也比过去更好了一些。事实证明,在落后贫困的社队,最突出的矛盾是社员没有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包产到户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发展了,社员吃穿有了保证,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其他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现在的新矛盾尽管形形色色,但比生产发展不起来因而造成的重重矛盾,应该说都是枝节问题。生产不发展,集体化的程度再高、再“纯”,分配再“平等”,也只能造成大家普遍贫困;反之,集体化程度不那么高,不那么“纯”,但因为适应于当地生产力的状况,尽管说起来不那么动听,人们的收入也有差距,但是到头来,必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大家都富起来。我们应当权衡利弊,不可因噎废食。不管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加强领导,及时解决问题,不断完善、提高。如果放任自流,好办法也可能会得出坏结果。

三、性质

既然包产到户利大于弊,对改变穷队的面貌有显著作用,已为大量的客观事实所证明,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广泛的议论呢?这主要是由于对包产到户的性质认识上有分歧:有的同志认为它是多种多样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一种;有的同志却认为它把集体经营变为个体经营,背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本质上倒退为单干,是方向性的错误。

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私有制是产生剥削关系的基础。公有制则是对剥削制度的否定。公有制才能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坚持这两条,就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就同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有了根本的区别。至于经营管理方式、劳动组织规模以及计酬方法等等,可以多种多样,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不能硬说哪一种社会主义,哪一种不是社会主义。遗憾的是,多年来由于反复批判“三自一包”,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把破坏按劳分配的假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把符合实际需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好办法当作复辟资本主义。久而久之,似乎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而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看见“包”字比遇到瘟疫还要害怕。其实,即使分田单干也并不等于搞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般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何况包产到户还不等于分田单干。在这里,不妨把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略作对比:

(1)分田单干与集体经济已割断联系,对集体经济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包产到户则是集体经济内部的一种经济关系。它以承认生产队的存在为前提,经济主体是“生产队”,承包者是“户”。“生产队”用“包”这个纽带同“户”联系起来,加强“户”的管理责任。两者各有权、责。社员个人是集体经济的一个成员,对集体经济有权利也有义务。

(2)分田单干生产资料完全归个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包产到户生产资料仍然归集体所有。社员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生产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必要的调整。耕牛和大型农具的所有权也是集体的,经过评价后交给社员使用或几户共同使用,使用者在必要时间内,应对照原定价向生产队补足消耗部分。

(3)分田单干是单独经营,自负盈亏,自食其力。包产到户仍然坚持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包产部分的产品,归生产队统一分配。生产队在分配这部分产品时,首先要扣除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等,然后再分配给社员个人。超产部分是社员付出超额劳动的成果,奖给社员,这正好进一步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有质的区别,它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的原则,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一种组织管理方法、一种责任制。它与工业上的计件工资制相类似,是比较便于考核劳动成果,比较直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管理方法或核算方法。

现在的包产到户,不像三年困难时期形式较为单一,而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其地区适应性的。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部分作物包产到户或到劳力;第二种是全部土地包产到户或到劳力,坚持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第三种是全部土地包产到户或到劳力,社员承包的产量,除上交给国家(征购)和集体(集体积累和社会负担)的部分以外,本人所得部分不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即所谓“大包干”或“包干到户”。这种形式简单、省事、为群众所欢迎,但是没有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生产队容易涣散,滑向单干。因此,对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的社队,应当经过工作,通过社员讨论,做到以下几点:(1)要保护集体财产,不可拆毁平分,迅速确定林权,禁止乱砍林木;(2)重申不准买卖土地,不准雇工,不准放高利贷;(3)对军烈属、五保户和其他困难户,要有妥善的照顾办法;(4)原有为群众欢迎,经济效果好的某些集体经营的生产项目要尽可能保留;(5)生产队和社员要严格履行各自承担的各项义务,债务债权要认真清理;(6)必须保持生产队的组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只要努力做到以上各点,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可以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因此,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独木桥,它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样,是集体经济的阳关大道。如果一定要把它比喻为独木桥,那可以说居住在深山沟中,不走独木桥就无法行动,无法前进,就无法到平坦宽阔的阳关大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走独木桥正是为了走阳关道。前一段,有些地方,社员强烈要求包产到户,因为可以提高产量,吃饱肚子;有些干部坚决反对包产到户,以为方向不对,怕受批判,发生了所谓方向与产量的矛盾。其实,方向和产量应该是一致的,不能提高产量,还有什么正确的方向呢?《西游记》中,唐僧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头疼。现在要求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落后贫困的社队要求包产到户,有些同志也觉得头疼,生怕“右了”,“倒退”,“犯方向性错误”。这说明我们头上还有紧箍咒,思想还没有解放。我们应当明确认识,对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来说,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从全国来说,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四、前景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农业生产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在经营管理上要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

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坚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在那些生产力水平很低、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有所发展,就不要搞包产到户,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只要定额合理,验收认真,也可以比较切合实际地测定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按劳分配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这种责任制比死分死记、死分活评要科学得多,适用于干部管理水平较高的地方。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群众满意或者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最好稳定下来,继续完善、提高。

目前全国搞包产到户的队约占20%。有适宜搞而没有搞的,也有不应搞或可以不搞而搞了的。对后一种社队,要允许它试验一下,搞它两年,让实践来作结论。即使搞不好,只是极少数地方。好,可能摸索出一些新的经验。

经济水平、管理水平属于中间状态的社队,在全国占一半以上。这些社队内部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容易接受外部影响。只有加强对这类社队的工作,才能稳定全局,促进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类型的社队,现行的责任制形式,凡是群众满意或者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都以稳定为好,继续完善、提高,不可轻易变来变去。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责任制的形式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最近在许多地方先后出现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一种大有发展前途的责任制。其具体做法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的包产,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分别到组,到劳力,到户;生产过程的各项作业,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分别奖励;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比如,陕西省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山西省吉县东庄生产队、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红星大队、湖南省零陵县赵家生产队,都由于采用这种办法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从这

些典型材料中可以看出,这种责任制较之一般的、“小而全”的包产到户或其他形式的责任制,有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既能满足社员联产计酬的要求,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又能发挥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的优越性,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它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有利于推广科学种田和促进商品生产;有利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有利于社员照顾家庭副业,对四属户和困难户的生产和生活作适当的安排。这种形式,既适用于现在的困难地区,也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项目的增加,向更有社会化特点的更高级的专业分工责任制发展。

还有一些从事农业的生产队,在原来田间管理、责任到人的基础上,发展为联系产量计算奖赔,也具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某些优点,干部、群众比较熟悉,乐于接受。

在江、浙、东北等省区以及大城市郊区的一些社队,多种经营比较发达,机械化水平较高,有的已突破生产队范围,以生产大队以至公社为单位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是个新的发展。辽宁省锦州市郊区西郊公社,今年对580户社员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推动了农、牧、副业的大发展。如唐庄子大队四队有5头奶牛,去年队里两个人饲养,共产奶8200斤,总收入1500元,除去工分、饲料,队里赔1000元。今年包给任忠善一家,全年产奶2万斤,收入4600元。同去年比,向国家多交11000斤奶,集体多收入2500元,个人纯收入1600元。

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可喜的新事物。一个是包产合同。1978年,少数社队由于推行大包干式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需要开始试用,曾被讥为“假戏真唱”,但是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已有较多的社队积极推行并逐步摸索到比较系统的经验。它把单靠行政命令办事的老习惯变为用经济办法领导经济,发展下去可能为农村工作打开新的局面。另一个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它把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同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能发展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为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以至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闯出一条新路。

自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我们长期间一直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就是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全民所有制只需要一个模式,集体所有制也只需要一个模式。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认识不但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应该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

许一定数量的其他补充成分,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开展竞争,发展商品经济。没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主义只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广阔的原野,沿着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联邦政府关于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的协定在维也纳签订

正在奥地利访问的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和奥地利工商部部长施塔里巴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了字。

根据这项协定,中奥两国将在机械与设备制造、采矿与冶金工业、石油化工、电子与电子技术、建筑业、食品工业和农林业等方面加强合作。协定有效期为1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北京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海一行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北京会见由泰国内政部劳工厅长长维吉·桑通率领的泰国劳工代表团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意大利全国合作社联盟主席奥内利欧·波朗迪尼为团长的意大利全国合作社联盟友好代表团

由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哲学教材讨论会在昆明闭幕

11月6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由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塔玛拉·多布林率领的代表团

会见时,邓小平说,我们在建设面临的困难很多。当前经济建设的中心是搞经济调整工作,这不搞不行。讲大话、空话是不行的,要扎扎实实去做。他说,我们确信,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看到了希望。社会主义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

塔玛拉·多布林说,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们一贯政策,也是我们的坚定意志和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就,罗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发展。